

季

辛

吉

七

訪

北

平

尹慶耀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季辛吉博士在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中稱：「我們不能以若干明星人物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礎。我們不能依賴每隔幾年就出來一位安排一切的人物。這不可能由一位總統或一位國務卿來完成。」

然而，季辛吉本人就是一位僕僕風塵安排一切的人物。雖則已故的杜勒斯國務卿曾被稱為旅行最多的美國外交當局，但季辛吉顯然已後來居上。他的旅行是值得重視的，問題是他的七度北平之行，究應重視到何等程度。

從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季辛吉已七度訪問北平。第一次為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是由拉瓦爾品第飛往北平，與周恩來等會談，決定了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訪問毛共；第二次為同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經由夏威夷、關島、上海到北平，安排尼克森往訪的細節，其時聯合國大會正在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季氏此行無疑在客觀上助長了毛共的聲勢，便利了它進入聯合國；第三次為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是隨尼克森往訪，除與周恩來會談外，並會見了毛澤東，雙方還發表了「上海公報」；第四次為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亦經關島、上海飛平，係向毛共說明尼克森訪蘇經過，似乎也就越南問題取得某種協議，於是一個月後巴黎越南問題秘密會談恢復，十月間對和平協定的大綱已大致確定；第五次為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乃越南和平協定簽署（一月二十七日）後不久，由香港經廣州赴平，曾會晤毛澤東，並決定互

在對方設立「聯絡辦事處」；第六次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及十四日，係訪問中東各國後經巴基斯坦轉往北平，是以國務卿身分訪毛之首次。雙方商定，應該繼續擴大聯絡處的工作範圍。第七次為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九日，係於福特總統訪問日、韓并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會談後前往中國大陸，向毛共說明福布會談經過。季氏在平曾晤周恩來，但以喬冠華為主要會談對手。此次會談，雙方同意福特總統於一九七五年訪問中國大陸。對於季辛吉第七次訪問毛共，本來就可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想法，作不同的觀察與判斷。

如果我們記起一九七二年尼周「上海公報」中說：「雙方同意，他們將通過不同渠道保持接觸，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國高級代表前來北京，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進行具體磋商並繼續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這項美國高級代表一向由季辛吉擔任，那麼經過一年多時光，他再到中國大陸去兜一個圈子，也就像是例行公事了。

尼季外交（現今福特總統仍然蹈襲此一路線）本來就是「均勢（Balance of power）外交」，雖然尼克森說不利用毛蘇的緊張局勢，季辛吉也說不「籠絡其一以對付另一個」^①，但拉出毛共來均蘇聯之勢，恐怕仍然是他們政策設計當時的動機之一。試看，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毛之後，五月就訪問蘇聯，而每次美蘇高層會談後，季辛吉都要到北平去說明一番，那似乎就是要保持一個「均衡」的形勢。照此說來，一九七四年六月尼布莫斯科會談之後，季辛吉就應有一次北平之行，可是他沒去。直到十月福布海參崴

會談後他才成行，那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既然必應有此一行，也就不必過於重視了。

自從一九七三年二月美毛互設「聯絡辦事處」以來，雙方關係并無進展。同年十一月季辛吉第六次訪毛時，公報中所謂「繼續擴大兩國聯絡處的工作範圍」，也未見諸實施，據傳毛共對此深為不滿。福布會談地點的海參崴，原本是中國的領土，當毛蘇邊界爭執相持不下之際，美國答應與蘇聯在此會談，使得毛共頗為難堪，因而毛共在十一月七日給蘇聯十月革命紀念的賀電中，突然表示願與蘇聯談判互不侵犯協定，那是充滿酸甜苦辣鹹味道的誘餌，目標并非單純指向蘇聯，面對着這樣一個由酸而妬、由怨而怒的對手，季辛吉將以何事何物來予以安撫？

尼克森在水門事件中跌倒，福特總統繼之登台。毛共內部則毛老周病，派系鬥爭浪急風高。雙方對外政策會不會有所改變？季辛吉在北平時，雙方會不會量量身材斟酌盤？福特總統將於一九七五年訪毛，這是在盛傳毛共即將召開四屆「人大」之時的決定，也要在一九七六年美國大選之前實施。從這些方面看來，季辛吉第七度中國大陸之行，就有注意的必要了。

有人說，一九七四年十月季辛吉訪蘇時，應允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會談是一大敗筆，因為那很容易激怒毛共。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認為那即使說不上是可圈可點，但至少和季氏七度訪毛時攜眷同行，有異曲同工之妙。

關於美毛間最近一段關係，要用冷淡或停滯的字樣形容，委實并不為過。美毛「關係正常化」并無進展，而毛共對美國派遣資深外交官阿克志使華，以及應允中華民國增設駐亞特蘭達及駐堪薩斯總領館、駐關島及美屬薩摩亞領事館及恢復駐坡特爾領館，則深感不滿。

毛共雖允許美國在平設立「聯絡辦事處」，但連那個聯絡處主任都難與毛共高級人員接觸。一九七三年時，那個聯絡處一位經濟官員返國休假，香港的美國領事館派一經濟官員暫代，毛共對其申請簽證置不作答。該聯絡處職員勃拉特因車禍被毛共迫使離平，美國擬由港派員接替，毛共也不給簽證。

。美毛關係改善後，毛共允許美聯絡處及駐港領館代表，於廣州交易會時在穗設辦事處。可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季交易會，毛共僅允美聯絡處派一代表，對香港美領館兩外交官申請赴穗，則相應不理。同年六月，應毛共要求美聯絡處調走由六名海軍陸戰隊擔任的警衛，換成了便衣人員。美毛間交互訪問的人員大量減少了，若干學者教授甚至像傅爾布萊特（James W. Fulbright）率領的參議院代表團，在大陸都無法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然而，來自亞非和西歐的重要代表團或政治領袖，差不多都獲得毛周的接見。毛共真的要同美國翻臉嗎？不會，它現在還需要美國。右述種種，是毛共故作姿態，向美國進行勒索、訛詐。季辛吉看得明白，却不願輕易接受。

如果說一九七四年六月間尼克森剛訪問過莫斯科，福特不便於十一月間再度前往，而必須在另外的地點與布里茲涅夫見面，那自然是對的。如果說蘇聯以福特訪問日韓，來到遠東，就提議在海參崴會談，一則表示遷就福特，一則刺激毛共的神經，那也并不錯誤。季辛吉對此焉能不知，但此舉可以藉機察看一下蘇聯在遠東的實力如何，也可以試探一下毛共的反應，究竟會強烈到什麼程度。毛共的反應果然來了，一方面故弄玄虛，在給蘇聯的賀電中要耍花樣，暗示北平也可能和莫斯科改善關係，拿來嚇嚇美國；但同時卻發表由喬冠華升任「外交部長」，以接替姬鵬飛。喬冠華出身清華大學，曾經留學德國，通曉外語，為西方所熟知，并被認為是周恩來衣鉢的繼承人。他的任命，就象徵着毛共對西方政策不變，希望美國不要過分誤會。本來，文革以後毛共內部人事異動，都不正式發布，只是在某種重要場合，「新華社」報導參加人名單時，突然在某人姓名上加了某一個頭銜，人們就知道他已出任什麼職務。可是這次喬冠華的任命，是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由毛共「外交部」向駐北平各國使館發出通知，並加解釋「這是普通的人事調動，沒有什麼特殊意義」。這真是欲蓋彌彰，單從時間上說，人家也明白是怎麼回事。聰明如季辛吉者，難道會看不穿毛共那種色厲內荏的滿腹心事？

季辛吉第一次訪問毛共，是在稱病中由巴基斯坦祕密抵平，當時是與毛共初步接觸，成敗未卜，或許有祕密的必要，但因此使得日本受到震撼，極不高興。在第七次訪問毛共時，再沒有祕密的必要，於是他們同其夫人南希·季辛吉，并攜帶女兒伊麗莎白和兒子大衛同行，北遊長城、南遊蘇州，悠哉遊哉，好整以暇，他對於毛共直接或間接擺出的姿態，顯得無動於衷。相

形之下，毛共倒表示得過於急躁了。

季氏這次闔家旅行，有過一些有趣的插曲。在參觀「人民公社」時，十三歲的大衛看見一名村姑強餵鴨子吃東西。這位與代表團其他人員一樣受不了十多次宴會五十多道菜的少年說：「這裏似乎很流行強迫吃東西」。又在紫禁城參觀時，記者問伊麗莎白覺得景色如何？她說：「很棒，只是比較有意思的可能不是他們給我們看的東西，而是不給我們看的東西」。這些未成年的兒女尚且如此，我們很難相信季辛吉吉本人會讓毛共那些過分奉承的招待、以及巧妙的隱瞞和偽裝所欺。

三

美蘇選在距中國大陸邊界僅三十七點五哩的海參崴會談，毛共真有如芒刺在背的不自在。於是在這次會談之前，毛共於十一月六日給蘇聯革命紀念的賀電中說：「中國一貫主張：中蘇雖有原則上的分歧，但不應妨礙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的兩國關係正常化。中國政府曾數次提出建議，雙方以協商方式取得友好睦鄰關係。因此，應實現中蘇兩國總理於一九六九年九月的諒解，就簽訂以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為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力衝突、雙方從爭議地區撤兵達成協議，再就一切邊界問題加以全盤解決，舉行會談」。

這通賀電在北平並未公布，但把英文稿分發給西方記者。而蘇聯在公布毛共賀電時，則把那一段刪去，理由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柯錫金和周恩來在北平機場會談時，根本就不曾有那麼一項協議。事實的真相如何呢？經我們查閱當時的資料，發現同年十月七日毛共政權為即將與蘇聯舉行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曾經發表一項聲明，其中有云：「中蘇之間的原則性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聲明中對於邊界問題說：

「中蘇邊界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也應該維持邊界現狀，不應訴諸武力」。

「鑒於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不斷發生，為了真正做到嚴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國方面進一步提出，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

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為了使兩國邊境局勢得以和緩下來，使中蘇邊界談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國方面建議，中蘇雙方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②。

聲明中明明是毛共的建議，賀電中變成了雙方的諒解或協議，蘇聯那肯吃這一套？毛共並非不知，所以那電文不曾公布，只分發給西方記者，而真正的目標則是美國，它希望以北平可能與莫斯科「和解」的姿態形成一個間接警告，使海參崴會談中，美國不致向蘇聯多所讓步。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人士，對那通賀電並不太重視，認為無何新奇之處。至於蘇聯的反應，除了在公布賀電時攔腰刪除有關毛蘇關係的那一段，並根本否認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什麼協議外，更由蘇共政治局委員基里林科(A. P. Kirilenko)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土庫曼首府阿什哈巴德(Ashkhabad)演說時宣稱，要繼續和毛共對蘇聯含有敵意的陰謀作鬥爭，但同時又表示準備與毛共從事實務談判，以促進雙方關係正常化。這是以與毛共相同的姿態，希望達成不同的目的。換言之，那是以莫斯科與北平可能「和解」的姿態，迫使美國在海參崴會談時不要過於強硬。及至海參崴會談結束，蘇聯對於毛共賀電中的要求再來個正式拒絕③。老實說，蘇共的鬥爭技巧，是不會亞於毛共的。

四

根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華社」電訊，季辛吉七度訪問毛共的公報如左：

「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美雙方進行了坦率的、廣泛的和有益的會談。他們重申堅持不渝地信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兩國政府商定，杰拉爾德·福特總統將於一九七五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季辛吉訪問毛共歷次公報中最短的一次。其中只有三點，也許可以提出來一談。

其一是公報使用了「坦率的」字樣來形容雙方的會談。依照共黨的習慣，這個字樣代表的意義是雙方各抒己見而彼此并不一致。當然，季氏五訪、六訪毛共時的公報中，也找不到這種字樣，只是那些公報中還提到一些具體事務，這次則否，那似乎表示季氏這五天的旅程和與毛共首領十多個小時的會談中，只有「坦率的」表現。

其二是說雙方還堅持信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在「上海公報」中，雙方有本來一致的原則，那用不着再「重申」，有不一致（包括「台灣問題」）的原則，再「重申」一遍，那表示雙方仍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其三是商定福特總統將於一九七五年訪問毛共，這是季氏此行雙方唯一能共同同意的一點。觀乎季氏此行有福特總統的智囊之一、前美國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代表、現任美國總統府祕書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同行，那麼這件事也許不是臨時決定的，而早在季氏的計劃之中④。

我們說過，在美蘇會談之後，季辛吉定要去向毛共作一番解釋，當然會順便談談雙方關係以及對世局的看法。就毛共說，它希望的會更多一點；就美國說，這純然是例行性質，不必攜帶什麼厚禮，但福特往訪，仍不能不說是毛共的一種收穫。

福特總統仍然執行尼克森主義的外交路線，但最近也展開了自己的外交活動。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遠東之行，他訪問了兩個盟邦，和一個敵方對了話。雖然純屬禮貌訪問，他此行確已改善了美日的關係，而曾經有過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紀錄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也於十二月十四日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時稱：維持和加強日本與美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基礎。並表示決心忠實地履行不久前美國總統福特訪問日本時和首相田中角榮發表的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

福特訪問漢城，對內部紛擾迭起的韓國政府有所幫助。而其海參崴之行，突破美蘇管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僵局，達成爲期十年的限制洲際核武器協議，不能不說是一項成功。十二月中旬，福特總統與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馬丁尼克島的三天會談，竟能消除彼此歧見，就石油與黃金問題等達成協議，更近乎奇蹟。如果在一九七五年夏布里茲涅夫訪美之後，福特再赴中國大陸，對毛共加以適度的安撫，使「均勢外交」得以圓滿進行，那麼對他於一九七六年競選連任，或許不是一件壞事。可是，對於

一個沒有外交關係，而其政治體制已被破壞得不像個國家樣子的共產政權，有沒有要美國兩任總統連續去訪問的必要呢？

埃德加·史諾（Edgar Snow）曾在所著「漫長的革命」一書裏寫道：「（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時，將是進入一個同他的國家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的真正國家元首並沒有擔任任何行政職務」。福特前往北平時，這種種情勢，即使形式上有所改變，實質上也是換湯不換藥，從民主國家的立場看，這算是什麼「關係」？史諾又寫道：「……尼克松……採取了一種有禮貌的做法，前往會見他們，從而提高了毛澤東的威信……過去的藩屬的國王曾經帶着東西向北京進貢，但是在過去，從來沒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首腦這樣做過」⑤。我們相信福特未來的北平之行，只是安撫作用，但無端提高毛共的地位，仍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五

季辛吉在平會見了周恩來，連翻譯時間在內共談了三十分鐘。他不曾見到毛澤東，那不是由於路途遙遠，因爲毛的匿身處距北平僅九十分鐘航程；那不是由於毛的健康已不能支持，因爲在最近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毛已接見了八批外賓，而且，季辛吉走後，毛於十二月七日還接見了薩伊總統莫布杜（See Soko Mobutu）。說真的，那是毛共故弄姿態，表示冷淡。從另一意義言，也反映出季氏此行，并未給毛共開出滿意的支票。

毛共接近美國，原屬事非得已，那乃是恐懼蘇聯突襲的一種「投保行爲」。但毛共慣技是一石多鳥，得隴望蜀，又妄想「台灣問題」上打歪主意。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從史諾的著作中，瞭解毛共的陰謀。他在所著「漫長的革命」第二十五章「實力地位」中透露，毛共對這個問題採取兩個步驟：「首先是美國和中國（毛共自指）共同宣佈，它們打算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它們之間的所有爭執，其中包括關於台灣的爭執。其次是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同意把它的武裝部隊撤出台灣和台灣海峽。關於如何撤出和何時撤出的具體步驟，將是以後討論的問題」⑥。

在尼克森訪問毛共的「上海公報」中，美國并未同意甚至也不會「注意到」毛共自說自話的立場，至於美國本身的立場則用如下的文字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

美國只說台灣是「中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為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這樣主張，美國自然不用着提異議。美國關心由中國「自己」和平解決這個問題，表示它並不認為美國可以代表誰來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說美國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應該永久留在台灣，以全部撤出為最終目標自無不可。但在那個「前景」未能實現之前，則只能隨着緊張局勢的緩和而減少。

這段文字，應是出自具有高度智慧的外交長才之手。不過，我們不同意當時自由世界的一般推測，以為毛共已採現實主義立場，把此一問題擱置。毛共或是用些模稜含糊的詞句，或是把各說各話的主張併記在同一文件中，而後利用時機、形勢，把文件作對己有利的解釋，撒潑撒賴地喋喋不休，迫使對方節節後退而它則步步進迫，那是毛共對中國政府、對蘇聯共黨都使用過的伎倆，美國也是應該時時警覺的。

美國對華政策的原則，如所謂尊重傳統友誼，維持外交關係，履行條約承諾等等，依我們看那也是美國整個對外政策的原則。這不僅由於美國歷史上沒有過片面撕毀條約、背叛盟友的紀錄，而且由於七十年代對外政策的設計人尼克森曾明白宣布：「儘管世界上發生了這些變動，但有一項主要的事實始終未變，那就是：美國的參與，仍然是任何穩定而和睦的國際秩序所必備的條件」⑦。這個對外政策的執行人季辛吉則聲稱：「美國從來便不是一個孤立主義者」⑧。他們都瞭解美國所負的世界責任。正是為此，尼克森才說：「雖然我們致力和過去的敵人改善關係，我們決不會拋棄我們在世界各地的盟國和朋友」⑨。季辛吉則認為：「我們應經常記得，我們與友邦的友誼的活力，乃是減低我們與敵方間緊張局勢的必需條件」⑩。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已懷於「無信不立」，和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存在着條約關係的美國，當然是不能「無信」的。

基於此一觀點，則最近美國有關官員屢次表示對華政策不變是可信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國務院無任所大使麥克羅斯基（Robert J.

MacIlloskey）經由人造衛星答覆香港記者的越洋訪問時說：「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不會降低」。這顯然也是對賈克遜（Henry M. Jackson）參議員所倡大使館與聯絡處「易位」主張的答覆。

六

本來，在季辛吉離開華府之前，就已表示他此次北平之行不會有什麼「戲劇性」的表現。在尼季外交的初期，確實有些祕密主義和戲劇化的色彩，那是有原因的。從一九六六年季辛吉那篇「國家結構與外交政策」文章看來，他似乎不大相信制度化，他認為制度化也就是官僚化，一件決策經過龐大官僚機構的層層作業，不僅會誤時甚或會變質。他把蘇聯和毛共的政治體制加以比較，認為毛共官僚化水準較低，領導者個人權威超乎官僚政治之上，反而會有急劇轉變的可能。也許是在這樣的假定上，尼季才和毛周之間，展開高階層的祕密接觸，而有了一九七一、七二年那樣戲劇性的表現。但這究竟不太合乎民主國家外交的常軌，難以長久維持。何況尼克森業已下台，毛周則行將凋謝，而季辛吉本人更不僅是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并且是國務院的主管，是不能常作明星式表演的。

敵對了若干年之後的突然接觸，是成是敗，雙方都沒有把握⑪，自然也有祕密的必要。可是，這種被盟國認為越過自己頭頂的作法，對美國要搞好夥伴關係是不利的。日本受尼克森震盪而一頭倒進毛共懷裏，美日關係有一陣子是不太好的。歐洲國家認為美國太熱中與蘇聯「和解」，而冷落了友邦的關係。現今美國與毛蘇之間總算搭上了橋，於是福特總統就訪問日韓，與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法國總統季斯卡先後舉行了會談，且已邀請英國首相威爾森（Harold Wilson）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底訪美，而季辛吉正考慮可能於一月間訪問中南美。當與盟邦從事協調時，對敵方就更不易有戲劇性的發展了。

毛毛為什麼會接近起來了呢？想到彼此的動機，也就該到此止步了。毛共不會承認它想拉美國來嚇蘇聯，但史諾和毛周談話之後，曾公開寫道：「中國（毛共）對中美和解感興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改善它在對付俄國方面的戰略地位」⑫。尼季也一再否認打算利用毛蘇糾紛，但哈佛大學

出版的「美國對中共政策計劃書」中，則指出毛蘇糾紛，「這是中共對外所最注意的問題。我們可以利用中共對美蘇聯合對付它的恐懼；……美國自然也可以利用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來限制若干蘇聯困擾我們的趨勢」¹³。

美國已迫使蘇聯走上會議桌，也達成了十年期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美蘇和解已有進展，毛共這個法碼的作用也就越小了。反觀毛共，雖然它口口聲聲說蘇聯是「聲東擊西」，其威脅目標是西歐，但它絕不敢對「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有一絲兒鬆弛。另外的消息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當日季辛吉抵平）「華盛頓郵報」刊載英國毛蘇問題專家馬克斯威爾（Neville G. Maxwell）發自北平的專稿，透露同年四月、六月、八月、月中旬毛共曾三次接獲第三國的警告說，蘇聯即將進攻毛共，這項消息經鄧小平與外國人會談時證實。那個第三國意指美國。馬氏還指美國認為毛蘇間爆發戰爭不合乎美國利益，從一九六九年就對毛共有過警告。又同年十二月十七日「法新社」從東京轉述了倫敦「每日電訊報」的報導，指出十一月間毛蘇軍隊曾在「中蒙」邊境上發生了五次衝突。看來，毛共目前仍須抓緊美國這根救命草，美國實在沒有接受敲詐而多所饋贈的必要。而毛共目前正如同前美國駐北平「聯絡處」副主任任金斯（Alfred Jenkins）所說：「中共在聯合國內和在內部的新聞媒介上，對我們所作的抨擊，遠超過他們的原則和政策所需要的程度」¹⁴。美國又何須如此容忍？

就是主張與毛共接近的美國人中，似乎也沒有人喜歡毛共那套政治體制。素有鴿派之稱而行將離開參議院的傅爾布萊特，最近也指出毛共的對內政策比蘇聯更壞¹⁵。當然，毛共更不會贊成美國的政治體制。念及中美兩國人民間的友誼，人們會認為美國不該去接近迫害人民的毛共。至於雙方的貿易，照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德（Michael J. Mansfield）在北平表明，其總額難達一〇億美元¹⁶。曼氏係應邀率團訪問毛共，先後與毛共領導人進行了十五小時（他與周恩來的談話長過季辛吉）「坦誠的」會談，但他承認彼此仍有歧見。甚至連他建議在中國大陸設立一個美國新聞處，毛共都不答應。看起來，毛共還是「端」的蠻高的！

七

根據新聞報導，季辛吉此次在平遊覽天壇，獨有他拍手得不到回聲。在

季辛吉七訪北平

一次集會中，他一個人鼓掌也無人響應。看來他在那裏是有些「曲高和寡」了！我們得承認，季辛吉在外交方面是富有「道義目標」和遠大理想的。他在一九七三年第二十八屆聯大致詞時，就談到：我們的目標是一個勢力集團和均勢皆不再適用的世界；一個以正義而不以穩定為當務之急的世界；一個各國視合作是世界的利益亦即是本國的利益的世界。但是我們要走向這個未來的世界，就不能不先維持現在的世界的和平。如此說來，季辛吉心目中的「和解」，只是走向最終理想的一個階段目標。可惜的是，蘇聯尤其是毛共，却不是這樣一種看法。

季辛吉七訪期間，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第一次會談中，他翻閱面前的三冊報告，對鄧小平說：「我將為你一頁一頁地唸到最後」。鄧嘲笑地問：「有幾噸重」？季笑稱：「總有幾噸，那只是開始，我還有別的資料」。鄧以嘲弄而帶莊嚴的口氣說：「我們這裏沒有這些。我們只有『小米加步鎗』」¹⁷。

一九七四年十月，季辛吉對雷斯頓（James Reston）的談話中，提到當前世界面臨的能源、糧食等巨大難題。他希望西方各國必須捐棄成見，在經濟上採取某種程度的統一步調，均攤某種程度的負擔，具備設置共同目標的某種程度的能力，絕不能處處仍以單純的國家為基礎。他也呼籲蘇聯和毛共不但要抑制武器競賽，而且要彼此合作設立一個世界糧食銀行。他說：「假如蘇聯及中共不肯接受本身應盡的義務，假如他們繼續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出產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那麼，我相信糧食問題永遠無法獲得解決」¹⁸。

可是，蘇聯和毛共會響應嗎？尤其是毛共，它的最大興趣是利用這些問題在國際會議中作鬥爭，對於十一月羅馬會議中決議經十二月十七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創設的「世界糧食理事會」，毛共乾脆來個不參加。不僅此也，同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中發言，還在以煽動的口吻說：「石油鬥爭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在石油鬥爭上已經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問題上也應該、而且能够做到」。

讓我們說，美毛之間除了在制衡蘇聯方面有一些實用主義的共同點外，在其他一切問題及所有理想目標方面都針鋒相對。那麼，現今美毛關係停止在一個應該停止的階段，是非常合理的。當然，季辛吉在北平說過，他對毛共的觀點，有了較深的瞭解，美國決定在執行其外交政策前認真考慮毛共的觀點¹⁹。福特總統又將有北平之行。但依常理推測，這些應該屬於美方人士

所謂的「聲勢」或「動態」(momentum)之類，不應再有其他意義。

傅爾布萊特在中國大陸時，從鄧小平、喬冠華等人所獲得的印象是，毛共在「台灣問題」、美毛建交問題等方面富有忍耐力，可以等上一百年。但我們不相信毛共會停止用種種手段，以期達其陰謀。過去，毛共申請入聯合國被拒時，周恩來也說過可以等一百年的話。可是，正當毛共猛烈抨擊聯合國，要組織第二個聯合國以資對抗時，某些人士已在設想如何把毛共拉進聯合國了。目前，毛共絕難期待同樣的「奇蹟」出現，中華民國的力量是不可輕侮的，自由世界人士也許在聯合國問題上悔不當初了。

我們相信季辛吉是富有理想及創造能力的外交家，但在民主體制下，他無法像毛共領導人那樣只憑一己的意見而為所欲為。因此，即使只有極少數專門督促政府實行責任政治而自己不必對其言論負責的記者，常常以「現實」為詞而天天在「幻想」裏兜圈子的專家，以及為了個人好惡和競選前程而故為偏袒的政客，季氏也是不能完全置之不顧的。走筆至此，我們希望季氏能時常用自己的話來提醒自己，那就是：只顧「實用主義」而無目的，終究會完全地毀了自己²⁰！

註釋①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紐約時報」載季辛吉對雷斯頓談話。

②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人民日報」。按共黨所謂「和平共處」政策，只適用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該聲明中對蘇聯使用此等字樣，是已不承認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布里茲涅夫在全蘇聯工會大會中講演時稱：「中國稱蘇中關係可根據和平五原則改善，北京方面不願就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再前進一步，因此，我們認為現在蘇中關係奠基於和平五原則上也好」。

③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合衆國際社莫斯科電稱，同日布里茲涅夫在外蒙烏蘭巴特聲稱，毛共帶有先決條件的談判建議，絕不能接受，且指責毛共領導人言行不一。

④同年九月傅爾布萊特等一行訪問毛共時，外間即傳說毛共有意邀福特往訪，此事或係出於毛共之主動。

⑤見史諾著「漫長的革命」，陳雲翻譯，一九七三年六月香港南粵出版社版，一九八、二〇〇—二〇二頁。

⑥同右，一九七頁。

⑦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毛蘇之後，於六月廿六日在華盛頓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上發表的文章，標題為「通往和平的真正道路」。

⑧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季辛吉為其出任國務卿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證詞。由則誠摘譯，標題為「基辛格論美國外交政策」，發表於同年十一月號「今日世界」。

⑨同⑦。

⑩同⑧。

⑪一九七一年八月即美毛宣布尼克森將訪中國大陸後，毛共保山地區革命委員會政工組印發的「關於『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展覽』說明書」中說：「我們是立足於打，但原則上從來也不反對談判。……中美大使級會談，已搞了十五年，中蘇邊界問題會談也談了一年半，現在，尼克松要來談，也可以，不管談得成談不成，主動權操在我們手中」。足見毛共亦無把握。

⑫同⑤，一九六頁。

⑬全書摘要部分，見郭榮趙先生譯本，一九七一年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版，一一頁。

⑭季辛吉七訪毛共之前，任金斯為「洛杉磯時報」所寫「美國不能犧牲中華民國而與中共建交」，中國時報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轉載第二版。

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傅爾布萊特在華盛頓全國記者聯誼會講演，見同日中央社華盛頓電，二十日中央日報。

⑯同月十五日「紐約時報」社北平專電報導十四日曼氏對「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談話，見十七日星島日報第二版。按美毛貿易因毛共外匯短絀減少購糧，據美「商業週刊」估計，一九七五年可能只有七億美元，比一九七四年要少二億五、〇〇〇萬美元。

⑰參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國時報第二版陶百川先生「季辛吉打出王牌而未攤」專文。

⑱同①。并請參閱同年十月十六日香港虎報及十九日中央日報。

⑲同年十二月廿八日法新社、合衆社、路透社北平電，見廿九日星島日報第一版。

⑳同⑱。